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歷史編 先秦卷 三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歷史編・先秦卷

三

12053

2674



中華書局

周秦城市的發展與特質

杜 正 勝

序言

- 壹 城邦時代城邑的特質
 - (一)「鄉山左右 經水若澤」
 - (二)寢廟、社壇與庫臺
- 貳 春秋城邑之拓殖
 - 叁 從城到郭
 - (一)封疆、郭與郭
 - (二)郭的誕生
 - (三)郭形成的基礎及其意義

肆 市場與作坊

- (一)遠市、市吏與市稅
- (二)市廛與市籍
- (三)官營作坊與工官
- (四)新城市的私營工業
- 伍 縣城的根源
 - (一)戰國的築城運動
 - (二)縣、郡與縣城
 - 餘論

序 言

概觀我國城市⁽¹⁾發展的歷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是祭、政與軍鎮三位一體的城邦，大約從西元前二千年到春秋中晚葉；二是統一帝國行政基礎的縣城，從戰國開始蘊育，秦漢成熟；三是坊制破壞、商業與行政並重的城市，唐宋之際至明清；最後是現代都市，城牆逐漸拆毀，沒有城牆的城市不斷形成，現在仍然處於這個階段中。

(1)「城市」是很含糊的名詞，用作歷史論文不易嚴格界定。唐代以前，城是城，市是市，意指截然不同；城指城牆周圍內的範圍，市不過佔城內的一小區而已。城市連言，凡城牆所包含的聚落都叫做「城市」，是宋朝以後的事。本文為行文方便，所謂「城市」即泛指城牆圈內的地區，沿用宋朝以來的通義；如果單言「城」或「市」，則嚴守古典的分別。至於現代這種沒有城牆的城市，固古代所未有，也非本文所指的「城市」。古典文獻所謂的「邑」也是一種聚落，甲骨文和金文皆作，从人，表城牆，就字形推測字義，人居牆下，有牆保護謂之「邑」。邑應是防護圍牆比較卑小簡陋的小城，據春秋傳說，邑的營建春秋書法用「築」字，不用「城」字，(左莊二十八)故知邑還够不上城。然而由於白話單字不詞，為行文之便有時連稱「城邑」，如果單說「城」或「邑」，也是依照古典分別義的。至於「都」，春秋以前係指有宗廟先君之木主的城，(左莊二十八)戰國時代則泛指大城，有的地方甚至只表示城，不必分其大小。所以「都城」不是國家首都，「都市」也與今日的義涵有別。先民造辭以表意，不同名詞代表不同的歷史內涵；但名詞不可能屢代創新，我們往往用舊名表新義，時間一久，層層相因，同一名詞却包含許多不同的歷史內涵。論史者要選各箇時代的本來面目，而使用的却是內涵義腔的名詞，故每每有難言之苦，「城市」就是一箇典型的例子。所謂邑、城、市、都，皆是古代不同時期的產物，代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本文為避免混淆，參證古義和通行語詞，暫時劃分如上。

這四個階段不僅反映城市的不同面貌，也代表中國社會發展的四個明顯時代。而城市發展過程富有歷史意義的關鍵也有四：(1)城邦的興起，聚落由無城而有城；(2)從內城到外郭，以至於縣城之出現；(3)城市區劃階級性之確立及崩潰，也就是南北朝隋唐里坊的興衰；(4)城牆覆毀。這四個關鍵不僅是城市發展的軌跡，也能反映我國社會的轉變。第一關鍵，資料尚不充分，存而不論⁽²⁾；第四關鍵正在演變中，尚難討論；第三關鍵已略有定論⁽³⁾，所以本文準備探究第二關鍵，即是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之間的轉變過程，雖上溯城邦時代，只以西周為斷，自西元前十一世紀至一世紀，大約千年的城市發展史。

本文討論城市，其目的有二，希望透過城市性質的解析重新體認春秋戰國的世變和兩千年統一帝國的基礎。傳統城邦之崩潰大概從春秋中葉開始，很多跡象顯示，往後中國社會產生一連串的蛻變，傳統的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政治組織和思想倫理莫不動搖，這就是史家通常所謂的春秋戰國之際的大變局。歷史發展以漸不以遽，社會經濟的轉換固然如此，即使政治制度短期內也不能憑空產生。這個大變局其實是頗為漫長的轉型期⁽⁴⁾，持續五百年之久，上溯於春秋中葉，下限延長到西漢初期。這時期社會活潑、經濟發達、思想澎湃、人生價值和觀念也不斷改易。單就工商業的發展而論，恐怕要晚到宋代才能與之相比擬。這些新現象是代傳統城邦而起的新城市的產物。然而新城市並未具備近代的意義，其工商性質發育並不完備，工商階級也沒有構

(2) 推測城邦起源於西元前二千年左右，也就是歷史上的夏朝，我們有幾方面的根據。第一、考古證據，山東歷城縣龍山鎮的城子崖、黑陶時期的遺址發現夯土城牆，發掘報告者說，城牆是黑陶居民在城子崖居住一段時期後才興建的，又與黑陶文化堆積並存。(城子崖，第二、三章)按，一般認為典型龍山文化約值西元前 2400-2000 年，故推斷城子崖黑陶期的城牆大概建於西元前 2200 年左右。第二、神話傳說，水經注引世本作篇曰：「鯀作城。」鯀是禹父，禹建夏朝據比較保守的文獻年代大概在西元前二千年，所以傳說活動於豫西的鯀在西元前二千年稍前築城，與魯東城子崖的考古資料可以互相參證。第三、社會演進方面對我們的推測也有強力的說明。典型龍山文化的前身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居民已經使用文字，手工業獨立，階級明顯分化，社會結構非常複雜了；再經過典型龍山文化初期的蘊育，城子崖黑陶期的居民能營城築邑實不足驚異。

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鎮王崗發現遠古的城堡，遺址位於嵩山南麓，當潁水和五渡河交會之處。城堡兩座，小型，東西駢列，考古所見的是夯土牆基。西城西牆 94.8 米，南牆 97.6 米，其餘各牆殘毀，不及此數，原城牆每邊大概不及百米。旁層出土木炭，測定年代距今 4010 ± 85 年(樹輪校正為 4415 ± 140 年)稍早於夏朝開國的年代。(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 274)這份簡報可以輔證上文的推論。

(3) 參見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清華學報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冊(1965)；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頁 263-376。

(4) 參見 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成一股持久的力量，這固有待專篇討論，但本文對戰國城市性質的分析或許能提供一點答案。

春秋中期以下五百年是一個複雜的時代，舊的歷史包袱未盡去，新時代的要素逐漸從舊傳統中蘊育形成。當時社會一方面固然顯得活潑、自由，另一方面也為後代的權威政府奠定下良好的基礎，新城市的工商業雖然興盛，傳統的軍政性質則有增無已，縣城即是明顯的現象。縣城一旦形成，中央集權的政治形態才有根基，於是一人在上，億萬人在下，造成李斯所謂「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的局面（史記本傳）如果沒有縣城深入民間，中央集權政府怎能有效地統治廣土衆民？這是國史的大關鍵，論其蘊育成長則發端於皇帝制度出現以前的戰國時代。

全文除序言和餘論外，計分五篇。第一篇城邑形勢及內部結構，說明城邦祭軍政合一的基本性質。西周天子政令有效運作時，城邑按照封建階級，大小有序，本文稱為「等級城制」。東遷以後，天子政令不行，諸侯紛爭，攻守雙方競相築城，故第二篇論春秋城邑之拓殖。如果第二篇說明城市的「量」變，第三篇從城到郭則是城市的「質」變了。本文認為內城和外郭分別代表兩個社會階段，外郭之興晚至西元前七世紀，是和內城不同時代的，它意味着傳統社會解體。第四篇論新城市的工商業，這是新時代裏惹人注目的新現象，並不是說春秋中期以後的城市是工商都市。故末篇特論戰國城市的軍政性質，說明秦漢以後的縣城的根源。周秦城市將近千年的發展雖然呈現不同面貌，舊因素汰除，新成分注入，但基本的軍政性格是一脈相承的；最大的改變，恐怕是從獨立的政治體（城邦）變成中央政府統治地方的工具（縣城）吧。

壹、城邦時代城邑的特質

（一）「鄉山左右 經水若澤」

作邑築城，原始動機和主要目的大概為着保衛聚落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古人叫做「干城」（周南兔置），也就是「扞外而衛內」。^{（5）}城邦時代成千上萬的國家不論大城或小邑，可能都營設了防禦工事，目前雖然尚無足夠的考古資料來證實，但分析古

（5）詩周南兔置朱熹集傳。

人立國建都的記載，城邑是具有濃厚的軍事性質的。

古代城邑大抵坐落於近水的高亢之地，正如管子乘馬篇所謂：「凡立國，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近水，關係民生；高亢，則顧及國防。近水固便於國人汲水飲用，舉凡污穢之排除，交通、貿易，亦皆需仰賴河川或湖泊，通達大江，再直瀉入海。高亢一則免於洪水威脅，而且通風，減少蚊蚋侵擾；更取其居高臨下，易守難攻，防護聚落的安全。管子度地篇說得最清楚，曰：

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瀉），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

「鄉山左右，經水若澤」，王引之云：「經」字義不可通，當作「緣」，緣者因也，因水及澤而建都邑。「鄉山」句，王氏從舊注云：「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張佩綸以爲「經水」不誤，「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即詩公劉篇所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也。「鄉山左右」似指山之南北。但尹桐陽則以「左右經水若澤」爲句，國都左右有水澤環繞，周東都左伊右瀍即此意。⁽⁶⁾日人安井衡從之，認爲古者字義有反訓之例，鄉山或即背山，「言建都之法必背大山，左右大水若澤也。」⁽⁷⁾這兩種句讀皆可通，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初墓新出的孫臏兵法可證，孫臏兵法曰：

城在淖澤之中，无亢山名谷，而有付丘于其四方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前名谷，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城背名谷，无亢山其左右，虛城也，可擊也。……城在發（疑借爲「沛」）澤中，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擊也。城在亢山間，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擊也。城前亢山，背名谷，前高後下者，牝城也，可擊也。⁽⁸⁾

立國建都的理想地理條件不外背高山，臨深谷，左右有丘陵或河川湖澤，其次至少也得有湖泊丘陵環於四方。周人卜居的岐邑有高岡，有陵阿，有泉池，⁽⁹⁾其地理形勢

(6) 王念孫、張佩綸、尹桐陽之說參考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合著管子集校，頁883。

(7) 安井衡，管子纂註，卷18，頁8。

(8)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孫臏兵法「雄牝城」，按，原簡失題，篇題係編者所加。

(9) 詩大雅皇矣：「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應是建國的上上之選。至於一般國家也多有丘陵倚俦，所以平民稱為「丘民」（孟子盡心下），直到春秋時代還留下許多取丘為名的地方，⁽¹⁰⁾爾雅甚且有專篇釋丘（卷六釋丘第十），可見城邦時代的城邑多在丘陵上。所謂中國古代山居，⁽¹¹⁾似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西周時代周王都城比較可以肯定的有岐邑（宗周）、豐、鎬和東都（王城）四地，⁽¹²⁾結合考古與文獻看來，四都皆符合「鄉山左右，經水若澤」的原則。岐邑是太王興建的，他避開狄患，「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大雅緜）於是在岐山南方，濱臨渭水的周原營建城邑，大雅皇矣所謂「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也。周原是總稱，高平曰原，那一帶是有丘陵的。水經渭水注曰：

（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水北即岐山矣。

周城就是宗周岐邑。⁽¹³⁾最近陝西扶風縣鳳雛村發現先周廟宮基址，⁽¹⁴⁾北距岐山 2 公里，由此往東約 2 公里的召陳村也發掘四座西周後期的大型宮室建築，下限多在西周末期，房屋分作東西兩列，東面有壕溝。三號房基址保持完整，四周有迴廊，東西以四排卵石襯底夯土築實，已使用瓦，與鳳雛村的先周遺存遙遙相對，兩大建築之間的強家村則出現鋪石子的散水面，可見這一帶應是西周的宮殿宗廟區，⁽¹⁵⁾可能是屬於文獻所述夾在岐山和渭水之間的岐邑。〔圖一〕

文王破崇，「作邑于豐」；武王纘緒，「宅是鎬京」。（大雅文王有聲）鄭玄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文王有聲箋）根據考古遺物和傳統文獻，這兩個

(10) 春秋、左傳多見之，如中丘（隱七）大丘（左隱八）、祝丘（桓五）、威丘（桓七）、桃丘（桓十）、穀丘（桓十二）、餘丘（莊二）、葵丘（左莊八、僖九）、乘丘（左莊十）、梁丘（左莊三十二）、杜丘（僖十五）、宗丘（僖十五）、壺丘（左文九）、長丘（左文十一）、鄆丘（文十六）、邢丘（左宣六）、清丘（左宣十二）、巢丘（左成二）、荅丘（成十六）、甄丘（左襄元）等不一而足。

(11) 胡厚宣，「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四冊；錢穆「中國古代山居考」，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一集。

(12) 還有西鄭可能也當做都城，竹書紀年云：「穆王以下都於西鄭。」，王國維以為這句話是束皙、臣瓚隱括竹書之語。見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頁 26。

(13) 宗周指岐邑而非豐、鎬，參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1955（10），第六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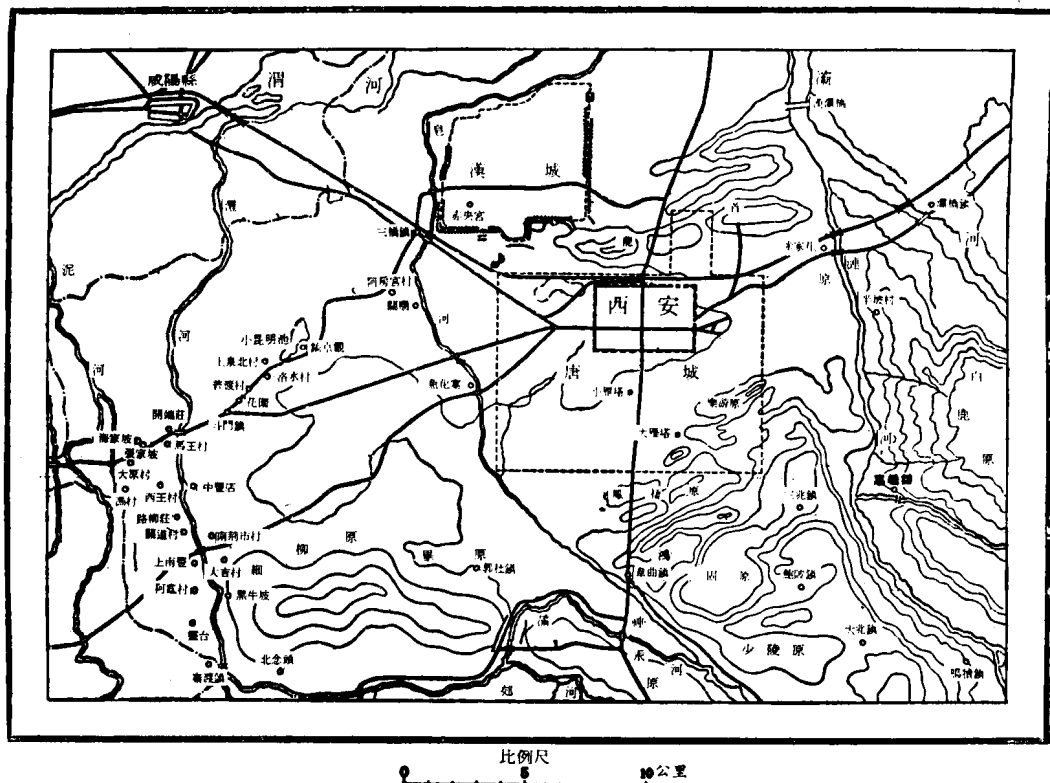
(14)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基址發掘簡報」，文物 1979（10），27-37。

(15) 陳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10），44-49；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建國以來陝西省文物考古的收穫」，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 126。

掘十座以上。(18) 1961 年發現一個青銅窖藏，計五十多件，(19)後來在馬王村附近又發掘二十多件的青銅窖藏。(20)在張家坡青銅器窖藏以東發現幾處夯土臺基，也有一小段鋪陶管的下水道，可惜夯土臺基破壞得很厲害，勾勒不出整體的結構。(21)張家坡有青銅窖藏，有車馬坑，也有夯土殘址，豐邑的中心即使不在此地，大概離上述六平方公里的範圍亦不遠。(22)灃東舊昆明池西北，即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斗門鎮一帶，面積約四平方公里，包含豐富的西周遺址。昆明池北界的土堤夾雜西周陶片，土堤西端下面壓着未經擾亂過的西周窖穴，(23)可見這個遺址部分被昆明池破壞了。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北與鄠水合，水上承鄠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穢，今無可究。」鄠池，即鎬池，武王鎬京在其左近，譙周、顏師古的看法與酈道元相同。(24)鎬京舊址東沿有高亢的高陽原，從其西沿至灃河，今日盡屬低窪的碱灘，是河流沖積地，(25)可見古代這一地區濱河。豐、鎬個別的地貌皆傍山帶水，如果把二京視而為一，北臨渭水，南枕終南，灃水、靈沼（泥河）流乎其間，細柳、高陽附於其右，也可以說是「鄉山左右，經水若澤」的。〔圖二〕

周公營建的東都亦山水兼備，尚書洛誥記載占卜求地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 (18) 灃西發掘的資料見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報告，包含 1955~1957 的考古成果；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隊「1960 年秋陝西長安張家坡發掘簡報」，考古，1962 (1)，20-22；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長安灃西張家坡西周遺址的發掘」，考古，1964 (9)，441-44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考古隊，「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清理簡報」，考古 1965 (9)，447-450，張長壽，「1967 年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1980 (4)，457-501。
- (19) 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羣。
- (20) 西安市文物管理處，「陝西長安新旺村、馬王村出土的西周銅器」，考古，1974 (1)。
- (21) 張長壽，前引文，考古學報，1980 (4)，494。
- (22) 張長壽說：「張家坡遺址儘管很重要，它不會是豐邑的中心地區。」其理由有三：(一)發現的房屋遺存構造簡陋，了無規模；(二)有西周各時期的中小墓和車馬坑，既非奠基墓，更不是王室墓，和殷墟小屯的情況有別；(三)此地迄未發現任何如周原規模宏大、結構完整的建築基址。（同註21）張氏意見聊備一格，我們只能以考古之「有」補文獻之「無」，或引考古之「是」證文獻之「非」，不能因為考古未發現而懷疑文獻舊說。
- (23) 胡謙盈，前引文，考古，1963 (4)，191，193，195。
- (24) 劉昭續漢書郡國志京兆尹長安縣條：「鎬在上林苑中。」注引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又引譙周古史考云：「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漢書地理志下：「武王治鎬。」顏師古注：「今昆明池北鎬陂是。」
- (25) 胡謙盈，前引文，考古，1963 (4)，189。



圖二 豐鎬遺址位置圖

歷史研究，1958 (2)，70。

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最後選擇了澗水之東、灋水之西、邙山之南、洛水之北的地方營建都城，這裏正是武王所謂「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嶽郛，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為四方樞紐的「天室」。(逸周書度邑) 澗水、灋水皆發源於邙山，南流入洛。春秋時代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周語下)。周語的穀水即洛誥的澗水，水經注說，穀水在穀城東與澗水亂流，自下通謂之澗水。(澗水注、穀水注) 東周王城當在澗洛匯合之處。而王城即西周的東都，平王東遷亦都於此，在漢代為河南縣，近來澗東考古發現東周古城，包羅整個漢河南縣城，推斷是王城。其遺址或不能與明清以下的洛陽縣城完全符合，但以近代洛陽縣城傍山帶水的形勢推之於周公的東都，似無不合。(26)

「鄉山左右，經水若澤」乃利用天然形勢；缺乏自然地利就要人工掘河，西周時

(26) 饒崧林纂修，洛陽縣志（據順治年間舊志，民國十三年重修），「城池山川全圖。」

代城隍已經對稱(易泰卦)，有城牆也有護城河了。其基本考慮是軍事性的，參證上引的孫臏兵法當極為明白。城邦時代，國家(State)的重心是城，古書叫做「國」，無城則無國家可言。故城之營建也非取其易守難攻不可。周初東進，建立武裝殖民據點，最重要的魯、齊和衛都有堅固的城堡。衛在朝歌，因紂王舊都，自然是大城。齊都營丘，是古國，晏嬰所謂「昔爽鳩氏居之，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又因之，」而後為太公所有。(左昭二十) 史記齊太公世家說太公與萊夷爭營丘，即爭奪這個古城。魯原係商奄舊地，⁽²⁷⁾商王南庚和陽甲之所居(古本竹書紀年)。周初封建，成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頌閟宮)庸，墉也；附庸即城邑⁽²⁸⁾。

周人築城的記載，周初尚少見，西周晚期就多了，尤以詩篇為主。就有限的資料考查，他們築城多與征伐、防禦密切結合。西周末年，北方的玁狁「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小雅六月)周畿震撼，天子乃命南仲，「往城于方。」(小雅出車)方的地望不可考，大概在北邊邊境。城成，周人就安心了，故詩人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出車)襄，除也。方城真能却除玁狁的威脅嗎？從周末詩篇看來，與小雅采芣的「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一樣，也許是出於詩人誇張的阿頌。然而城邑的防禦鎮戍作用，透過詩人之口，再也明白不過。宣王時代，韓侯守韓，大雅韓奕曰：「溥彼韓城。」溥，大也，似乎是擴建韓城。把城牆壘高加厚，將護城河濬深，即所謂的「實墉實壑」。據詩人說，韓侯於是能「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與韓侯同時的召伯虎，為申侯營築謝城，以戍南疆。大雅崧高曰：「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要使江漢流域的方國歸服，亦端賴於牢固的城池。周王嘗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大雅烝民)，方玉潤詩經原始云：「懷柔東諸侯，」是對的。故詩人贊頌仲山甫「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烝民)要使東方諸侯奉順王令，莫不響應，亦非築城不可。城邦時代，戍守、禦外、拓土、治民、威震天下皆仰賴於城，城之作用大矣哉！難怪成王謂伯禽

(27) 參見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集刊，第五本第一分。

(28) 魯頌「土田附庸」，左傳作「土田附敦」(定四)，召伯虎箋又有「僕庸土田」，經孫詒讓、王國維二家考釋，已知本為一事。敦乃庸之誤，古文「敦」作「辜」，「庸」作「辜」，形近相混。附、倍、僕一聲之轉。惟附庸之義，孫、王仍沿舊說，指「不能五十里」的小國。郭沫若釋作墉垣，或稍近之；但他把土田與附庸連言，以為「在規整的一帶方田之外附有墉垣」，則泥。附庸是城邑，土田則是城邑外的田野。郭說參見「附庸土田之另一解」(收入1977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及奴隸制時代，頁28-29。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閼宮)

基於軍事考慮的城邑何以能發揮這麼大的作用？稽考城邦的社會經濟基礎，似可獲得一些答案。城邦時代國有三寶，曰：人民、土地和財貨，大學所謂：「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掌握了人民和土地，才控制得財貨；而人民與土地的掌握則繫之於城。呂氏春秋識大覽曰：

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

呂覽的「賢」和大學「有德此有人」的「德」相近，作者議論的成分高於歷史的實情，可以存而不論；至於說得乎民心就能得城，於是得地，也不必太坐實。但它能把土地、人口和城邑相提並論，要發現其中的關聯，却饒有趣。歷史的真相，恐怕是爭得城邑才能控制人民及其周圍的土田，役使民力，國斯有財；反過來說，人民與土地的維護也得靠城池。借用呂覽之文而稍變之，應說：地從於民，民從於城；城得而民得，民得而地得。

古代地曠人稀，有人民，才能生產；無人民，雖封疆無垠與無立錐之地不異，故周初封建多強調人力。宣侯大簋雖錫土與錫人並列，大孟鼎則只舉人而不及土，⁽²⁹⁾衛佗論魯、衛、晉之分封尤斤斤於殷民六族、七族與懷姓九宗。(左定四)惟人民與土地仍然不能分開，大孟鼎記周王曰：「先王受（授）民，受（授）疆土」；衛佗亦曰：「聘季授土，陶叔授民。」人民要靠城邑來範圍，田土要靠城邑來衛戍。穀梁傳叫做「保民」(隱七)，左傳叫「完聚」(隱元)。鄭公叔段居京，左傳曰：「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隱元)完聚，杜預云：「完城郭，聚人民。」服虔云：「聚禾黍。」服說雖不誤，但不及杜氏深刻。人民不聚，禾黍不來，亦大學人民、土地先於財貨之意，但一切根源則基於堅固的城邑。李斯有見於此，故說韓王曰：「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韓非子存韓)遲至戰國末葉城池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情況還沒有太大的改變。

因此我們不妨說，城邦時代立國治民的根本端在於城，列國之間侵略攻擊的目標也在城。春秋中期晉卻至感歎「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左成十

(29) 宣侯大簋銘見商周金文錄遺，大孟鼎銘見兩周金文辭大系。

二) 八尺曰尋，倍尋係指城邑。⁽³⁰⁾城邑本爲保人聚民而作，現在却因爭奪城邑而殺盡人民，實令有心人感慨。他想以禮維繫城邦間的秩序，故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左成十二)以禮導政，使民安康，謂之「公侯干城」，是郤至的新解，其實統治階級之所以保聚人口者，何嘗放棄武衛而空守禮儀？詩經周南兔置公侯之干城豈非就是那些「公侯好仇」「公侯腹心」的「赳赳武夫」？

左傳記載邾文公卜遷於繹。(文十三)繹山地居戰略要衝，魯頌閟宮曰：「保有龜、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當地形勢，水經注猶能傳述。泗水注曰：

今城(邾)在鄒山(即左傳之繹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晉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保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有絕巖。

這樣的天然地利對弱小的邾國而言，當然是「保民」「完聚」的最佳去處，史官雖預言遷都「利於民，不利於君」，邾文公還不改初衷。繹山的邾城極具古意，很能傳述城邦時代城邑的真精神。

(二) 寢廟、社壇與庫臺

誠如以上所論，古代城邑的軍事與政治密切結合，而古代的政治和宗教也是一體的，所謂祭政合一，因此這三件事分不開。城邑外部的方位、地勢與城牆顯現其軍事性質，從城邑內部的主體建築也可揣測祭政和社交的活動。城內主要建築不外是廟寢、社壇和庫臺，缺一不可。作城不只是圈圍城牆而已。

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是宮、室「同實而兩名」(郭璞注)，家又只是室的一部分而已。周人久居黃土高原，「陶腹(窰)陶穴，未有室家。」太王遷來岐下，才開始「築室于茲。」大雅綿曰：「乃召司空，乃召司

(30) 尋常，杜預注和孔穎達疏皆作土地解，按原文論「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釋做城牆、城邑，或許較通。

徒，俾立室家。」這是營度居處；但本篇同章接著說：「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似乎宗廟就是室家，或者至少是宮室的一部分。一般而論，生人居處之所稱為宮室，設置祖先神主之處稱為宗廟。生人的宮室與死人的宗廟雖然有別，早先可能不嚴格區分的，⁽³¹⁾所以郝懿行爾雅義疏引楚辭招魂注云：「古者宗廟亦稱宮室。」⁽³²⁾文獻中廟宮多可通用，齊襄公之廟左傳曰「襄宮」，晉襄公之廟國語稱為「襄公之宮」，韋昭注云：「襄宮」，鄭、宋的太廟左傳皆稱「大宮」。⁽³³⁾這不僅是名詞之通假，實際的功能，古代宗廟也做為國君或貴族起居之所，故寢廟連言。廟以接神，寢藏衣冠。⁽³⁴⁾詩經記述召伯虎為申伯營築謝城曰：「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大雅崧高)西周之末詩人目擊喪亂，追撫盛世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謀)之。」(小雅巧言)這兩篇的寢廟即是緜篇的室家與宗廟，乃一體的建築，故鄭玄曰：「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周禮隸僕注)呂氏春秋與禮記月令論述祭祀亦多謂「薦寢廟」，⁽³⁵⁾高誘注：「寢廟，祖廟也。」有時單言「寢」，據呂氏春秋孟春記，行過籍田禮，「反，執爵于太寢。」高誘注云：「太寢，祖廟也。」寢廟一體，因此，大雅緜篇的「臯門」「應門」既是宮室之門，也是宗廟之門。⁽³⁶⁾

近年陝西岐山縣鳳雛村發現的先周建築遺址是一棟宗廟兼宮室的建築，亦即是寢廟。這個建築基址坐落在東西長約 100、南北寬亦 100 米的夯土台基的東半部，建築基址南北、東西各 45.2 與 32.5 米，共計 1,469 平方米，坐北朝南。門道、前堂、過廊居中，後邊有後室，南北構成一條中軸線，東西兩翼配置門房、廂房，左右對稱，布局井然有序。〔圖三〕房基極南是前庭，庭中有照壁，從留存的木炭痕迹推測，原來覆蓋著護頂。進去是門道，南北長 6 米，東西寬 3 米，夾在東西門房之間。經過

(31) 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觀堂集林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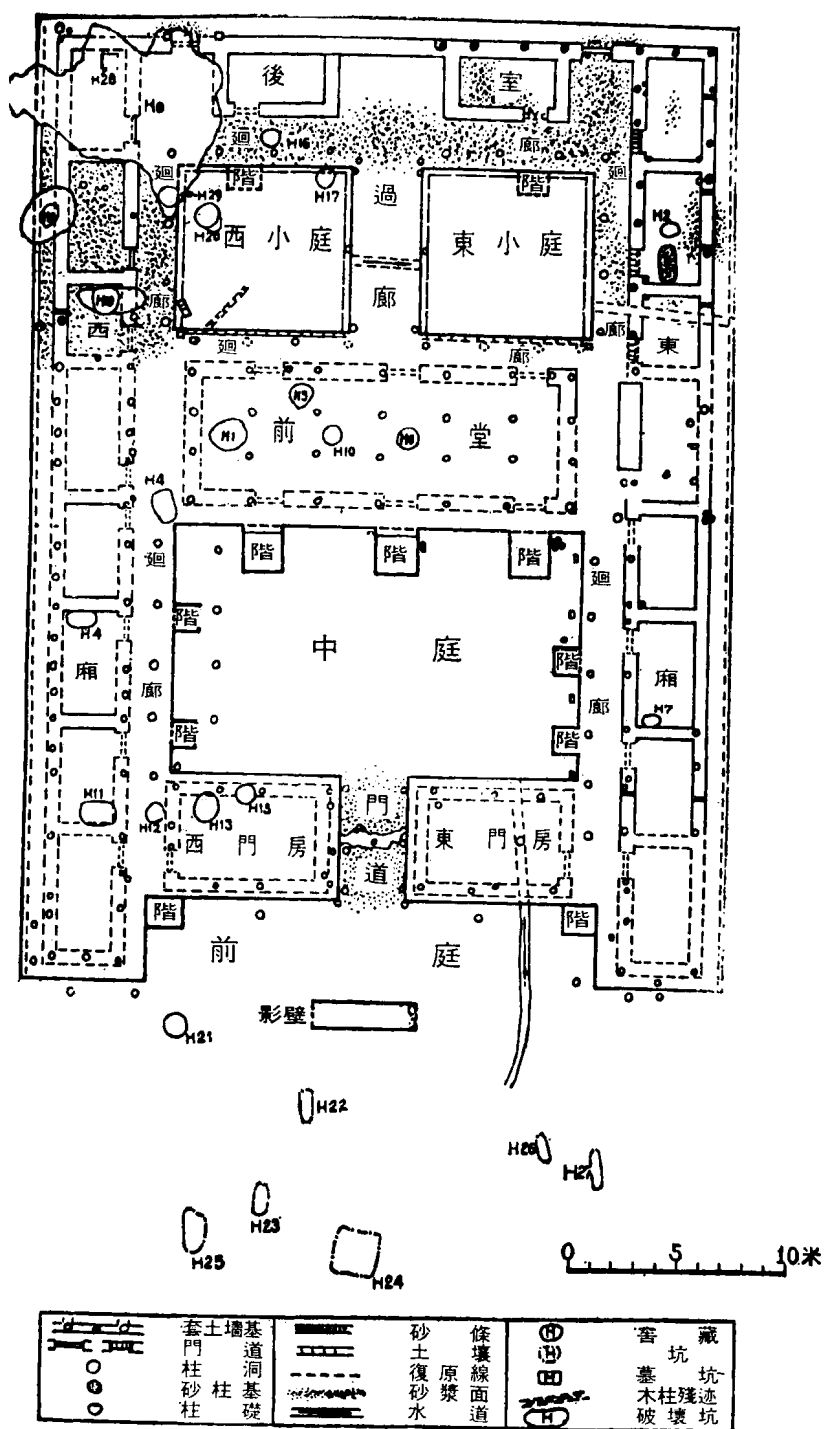
(32) 郝懿行，爾雅義疏「釋宮第五」(皇清經解，卷 1262，頁 1)。

(33) 分別見於左襄六晉語八、左隱十一、左哀二十六。

(34) 參見禮記月令正義。呂氏春秋仲春紀高誘注：「寢以安身，廟以事祖。」

(35) 呂氏春秋仲春紀：「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紀：「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孟夏紀：「以鬯嘗麥，先薦寢廟。」仲夏紀：「塗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紀：「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紀：「以大嘗麻，先祭寢廟。」季秋紀：「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紀：「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月令同。

(36) 緜：「廼立臯門，臯門有沍；廼立應門，應門將將。」臯門、應門，毛傳以為王之郭門與正門，鄭箋以為諸侯之宮外門與朝門，孔疏從鄭，謂「郭門為宮之外門。」似皆指宮室門。但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則岐邑之臯門、應門即魯太廟之庫門、雉門也。



圖三 鳳雛西周甲組建築基址平面圖

文物，1979（10），29。

門道便是中庭，是一所東西、南北 18.5×12 平方米的大院落。庭上則是前堂，也是整棟建築的主體。前堂台基比周圍房屋的台基高，通長 17.2 米、寬 6.1 米，面積約 104.9 平方米。其上排列著整齊的柱洞，南北四行，東西七列，柱子似乎支撐屋頂，而非用來隔間。前堂之後是過廊，左右各有一個小庭院。最後排的建築是開面五間的後室，朝南。這一系列中軸建築左右配置的廂房各八間，通長42米，進深 2.6 米。前堂、後室、廂房和門房都有迴廊連貫，不愁風霜雨雪；由於庭院皆露天，整棟建築光線充足，雨雪時甚至可以悠遊於迴廊之間賞雪觀雨。中庭北邊有三個土階以登前堂，東西各兩個土階通達廂房，東西小院各有一個土階連接後室，前庭東北、西北二隅也有土階登達迴廊。(37)

這座建築的建構與爾雅釋宮比較，頗多吻合。照壁，爾雅謂之樹，郭璞注：「小牆當門中」是也。門道的正門謂之應門，正門與照壁之間謂之寧。東西兩側門房謂之塾，郭璞所謂「夾門堂也。」房屋中間的大庭院爾雅謂之中庭，即金文的中廷。中庭近前堂的地方謂之陳。堂後東西小院爾雅無說，或亦稱庭。過廊或迴廊可能謂之壺。東西廂房謂之廂，在角落的四廂，西南謂之奧，西北謂之屋漏，東北謂之宦，東南謂之窆。後室謂之寢，主體建築的前堂謂之廟。故爾雅說：「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廟門謂之閤，廟前中庭之道謂之唐。唐下的排水道謂之甃，郭璞注引詩陳風防有鵲巢曰：「中唐有甃。」甃是瓴甌，這座建築遺址東塾台基下有一條向南排水的陶水管，發現水管六節，可以證明文獻的記載。不過兩周八百年內，宮室宗廟必定有相當的發展，大體容或不變，細緻不可能處處符合，向來釋宮之文總力求縫合各種文獻，(38)結果反泥。岐邑先周遺址是周人廟寢的早期型態，與爾雅釋宮可以吻合而不盡吻合，其故在此。

前堂謂之廟，也稱為太室或世室，太、世皆大也。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大房間，一若後世的大廳。據爾雅，廟是配置東西廂的室，因有兩廂，格局特大，故曰太室或世室。所以禮記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西周金文廟與太室是可通用的。大克鼎曰：「王才(在)宗周，旦，王各(格)穆廟，即立(位)。

(37) 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 (10)。

(38) 如李如圭，儀禮釋宮；江永，儀禮釋宮增注；任啟運，朝廟宮室考；胡培翬，燕寢考。

隴季右善夫克入門，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呼）尹氏册令（命）善夫克。」伊殷曰：「王才周康宮，旦，王各穆大室，卽位。隴季內（入）右伊，立中廷，北卿。王乎命尹封册命伊……」穆廟卽穆太室。準此類推，師兌殷一的康廟，虢方彝的周廟也都指太室而言。⁽³⁹⁾古制整棟建築謂之宮，最大的一間室謂之廟，宗廟是宮室的一部分，與後代宗廟、宮殿分開者不同。⁽⁴⁰⁾春秋中葉齊之寢廟制度猶遵循西周舊章，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曰：

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陳氏、鮑氏欲發動政變滅慶氏），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夷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慶舍臨祭而大事戒備，以其私屬軍隊環護齊侯之宮，這時他在宮內的太公之廟舉行祭典，故杜預注曰：「廟在宮內。」由於古代廟寢不分，岐邑建築遺址西廂第二室發現卜骨卜辭也就可以理解了。⁽⁴¹⁾

西周時期天子多在宮室的前堂舉行册命典禮，其儀式大抵如前引大克鼎、伊殷記載的情形。明旦，周王抵達前堂，卽位。金文簡要，所卽之位尚不清楚，惟據禮記祭統，並非立於廳堂之上，而是「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向。受命臣工由某大員陪佑，從前面的正門進入，立於中庭、北向。王呼史官宣讀册命文書云云，讀畢，受命者再拜稽首，對揚天子皇休，退出。祭統曰：「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家廟）。」册命典禮的前夜，王寢息於後室，大早穿過廊來到前堂，不必踏出整座建築一步。金文多有「王在某宮，旦，王各大室」之記載卽指此而言。⁽⁴²⁾我們根據岐邑新出的建築遺存來讀爾雅與金文，若合符節；如果以秦漢之儒的明堂解金文册命禮，自然發現立於中庭的臣工與立於阼階之南的周王相距二十六筵（220尺）以上的矛盾。⁽⁴³⁾其實包含明堂、玄堂、青陽、總章的明堂制度是秦漢儒者挖空心思的設計，漢帝又根據儒者的藍圖來營

(39) 師兌殷，見兩周金文辭大系；虢方彝，見李長慶、田野，「陝西郿縣發掘出四件周代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7（4）。

(40) 唐蘭，「西周銅器代斷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1）。

(41) 西廂第十一窖穴共出甲骨一萬七千餘片，卜骨占三百餘片，其他都是卜甲。參見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10）。

(42) 如望殷、頤鼎、哀盤、伊殷。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曰：「所云王在某宮者，必謂未旦以前王所寢處之地也。」近之。但把後室的寢稱爲宮，恐不的。

(43) 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